

书评徐显芬著《日本对华 ODA 外交：利益、权力与价值的动力论》

服部健治
(中央大学教授)

◎ 欧文东 译

◎ 原书为徐显芬著『日本の対中 ODA 外交 利益・パワー・価値のダイナミズム』勁草書房、2011 年 11 月、314 页。

1. 该书的意义与章节构成

该书作者是研究国际政治学的新锐，在南开大学提交了关于日本研究的博士论文，后来又在早稻田大学毛利和子的指导下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该书以日中两国为何既对立又合作的学术关注点为主线，掌握在日中关系中与政治（外交）和经济有关的广博学识和历史事项，通过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最终完成定稿。该书阐明了日本对华 ODA 所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

该书于 2011 年出版发行，但在第二年（2012 年），中国就因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领有问题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和反日骚乱。受此事态冲击，当前我们被迫从“根”上考虑日中关系。我想，该书作为此类的优秀图书之一，起到了提供学术启迪的作用。

当在电视报纸媒体上看到在中国各地发生反日骚动时，许多日本人内心深受打击。不用说对日资企业的袭击、破坏和掠夺之严重是一种打击，就是想到中国人对日本是如此之憎恶也是一种打击。同时，许多日本人还深陷“大惑不解”的心境之中，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日本为支援贫穷的中国推动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援助 ODA（政府开发援助），中国人不应对日本这样。

就算日本人饱受打击的心态无可厚非，那“大惑不解”此类的心情是否就是日本人应有的合理心态吗？“大惑不解”的背后似乎有日本被中国背叛的深层心理。日本人因有所期待所以才产生了被背叛的心理。ODA 就是日本有所期待，并向中国提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大规模的援助。那么，日本对华 ODA 是作为让其抱有某种期待的援助而实施的吗？

该书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质朴且人人都会有一种心情或疑问进行了清晰的阐述。一个自主的主权国家就宛如事业单位在开展存续活动，在其行使影响力之际，无须依据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古典概念，因为“权力”与据此定义的“利益”构成了原动力。因此，日本也意欲把 ODA 作为外交手段使用，以便对中国施加影响力。该书试图借助丰富详实的资料和大量的学术著作，从历史、多元和理论的角度，揭示日本的 ODA 外交。正因如此，我感觉，该书回答了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大惑不解”等的疑问，同时对出现“大惑不解”念头本身是否属于愚不可及的问题做出了解答。

该书包括序章和终章，一共 9 章。章节构成如下：

序章	政府开发援助与增强外交力度
第 1 章	日本对华 ODA 的启动
第 2 章	日本对华 ODA 全貌
第 3 章	日本对华 ODA 的政策目的
第 4 章	构筑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第 5 章	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
第 6 章	ODA 消极性关联的启动及其局限
第 7 章	ODA 的友好感情
第 8 章	ODA 对外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

2. 各章介绍

以下对各章内容进行概述。

(1) 序章

序章开宗明义，说明研究的主题、内容梗概和章节构成，便于读者对全书进行理解。该书的基本主题围绕 ODA 援助国的对外政策手段，阐明其有可能发挥的政策效果。该书根据此基本视点对日本 ODA 的特点进行了概括。ODA 顾名思义由“政府”、“开发”和“援助”三个关键词组成。政府是 ODA 的实施主体，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同时为免除受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规定资金赠予率的最低限为 25%。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向中国提供 ODA 援助？在小泉当政时期的“政冷经热”的现实背景之下，著者认为“要理解日中关系的构造，特别是理解日中相互认识与日中关系现状相背离的现象，须考察日本的对华 ODA”，并且指出“分析日本对华 ODA 的政策效果关系到对整个日本 ODA 政策效果的验证”，此问题意识可谓一针见血，切中了问题的核心。

著者以此问题意识作为前提而采用的分析方法论叫“政治学式研究法”，因 ODA 涉及与援助相关的政策制定机构、行为人和对外政策，因此提出了跨越内政与外交两个层面的分析框架。我认为，著者在研究日本 ODA 所带来的效果时，采用了不仅把政治和经济，还把宽泛的多维效果一并融入到其研究视野之中的“综合性研究法”。

作为分析研究法所规定的要素，著者提出了构成国际关系的“利益”、“权力”和“价值”三要素，主张弄清日本对华 ODA 的政策目的与效果，并以这三要素为基础，就 ODA 援助提出了四个根本性的设问。具体如下：

- 1) 如果构筑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是 ODA 的目的，那么 ODA 是否给受援国带来经济发展，是否强化了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否对受援国的政治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 2) 能否将中国纳入令日本满意的国际体系中(积极性关联)？
- 3) 能否朝着促进裁军和遏制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消极性关联)方向，对中国行使权

力？

4) 能否在培育对日友好感情上，期待友好甚至实现历史的和解？

(2) 第1章

根据序章所提示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在各章进行具体分析。

第1章就如何决定启动对华 ODA 的问题，分析日中双方的决策过程。首先，阐述一直不肯接受贷款、投资和外援的中国是在哪一阶段决定接受外国政府的贷款。1979年9月中国的谷牧副总理在访日之际，正式要求日本政府提供日元贷款。促使中国发生观念转变的毫无疑问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1届3中全会和在会上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当然，有几个背景也值得注意。譬如，中国在进行新的经济建设时出现资金不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而且中国自身的认识也发生变化，放弃了外国援助等同于殖民地化等的想法。

接下来，阐述日本提供对华 ODA 的决策过程。在决策时，日本的相关省厅^①之间在贷款援助项目的选定、中日友好医院业务是有偿还是无偿、是一次性提出贷款总额还是每年都协商、是有条件贷款还是无条件贷款等问题上存在对立。但是，这些问题最后都经大平正芳首相裁决而得到解决。同时，考虑到对各受援国的照顾，日本提出了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大平三原则），即：与欧美国家协调一致，维持与东盟国家的平衡，不搞军事合作。毫无疑问，著者所言的日本对华 ODA 的成行，是日中关系发展的标志，是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起点”。

(3) 第2章

第2章较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对华 ODA 的全貌”。先是宏观把握日本提供 ODA 援助的历程和特色，然后说明日本对华提供 ODA 援助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 ODA 金额在日本整个 ODA 总额中经常占据首位或靠前的位置，而且就是在开发援助成员国（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之中，日本的两国间 ODA 援助也占到绝对高的比率。这说明“对中国而言，日本是最重要的援助提供国”。

不过，日本对华 ODA 的援助政策也是有变化的，开始脱离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平三原则”，更改为 1992 年 3 月的“大来四原则”，即：促进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矫正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考虑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其背景有 1991 年 4 月制定的“ODA 四原则”，即：环保与开发并重，回避军事性用途，注意避免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和武器的进出口，注意民主化的推动、人权和自由等状况。同时，日本还向中国全面推出“ODA 四原则”，援助重点转向援助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造、内陆开发和环境保护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因日本国内出现批评 ODA 的声音，日本外务省于 2001 年 10 月制定了“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的援助理念，由以往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实现全面转变，重视“日本的国家利益”。提供援助的方式也改为单年度，援助项目也由基础建

^① 译者注：相当于中国的部委。

设转向更加重视环保和人才培养，援助区域也由沿海地区转向更加重视内陆。

（4）第3章

第3章是根据历史性原委阐述日本对华 ODA 的政策目的。对日本外交而言，ODA 是其重要的对外政策手段，但是，日本当初援助的重点是确保经济利益，无条件贷款的比率也很低。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随着日本对外 ODA 援助的增加，提供 ODA 援助被定位为日本重要的外交政策。日本强调与美国分担责任是其基本的“国际合作”，同时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以免遭受国际社会唯商业至上的批评，进而开始把 ODA 作为确保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一种手段来考虑。著者将之表述为日本权力的增强。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日本 ODA 遭受猛烈的抨击，被说成是“没有理念的援助”，1991 年 6 月日本提出了“ODA 大纲”。日本 ODA 援助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政策手段开始被赋予正当化的外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把援助的重点转向防止纷争，注重培养对日友好感情和“看得见的援助”。按照著者的说法就是行使注重“国家利益”的权力，我们将之视为国内理解支持与对外合作方略并存的举措。

日本对华 ODA 是以促进日本经济利益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目标，为实现对日能源供给、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三位一体、保护环境和培育人才等做出贡献。而作为权力增强和 ODA 政策效果的表述，就是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战略，即意欲把中国变成可预测的、可发挥影响力的国家，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然而，与是否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相比，中国倒是单独成了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为了满足“ODA 大纲”中的政治要求，日本对 1995 年 8 月中国实施的核试验表示抗议，部分冻结对华无偿合作，并以“日中关系恶化”为由中止了 2005 年度的日元贷款。

（5）第4章

第4章是以“利益”要素作为主干，考察日本 ODA 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就日元贷款的直接效果而言，ODA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领域建设和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还带来了改善中国投资环境和促进人员交流等的间接效果。尽管我们很难验证 ODA 是否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效果，但日中两国政府均认为 ODA 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ODA 与投资、贸易联动，对日中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建构做出贡献，推动了地区的稳定。然而，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稳定的命题是模糊的，具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和日中关系的稳定做出贡献，进而带来亚太地区的稳定、多元化和民主化，不过，这一命题是模糊的。

（6）第5章

第5章阐述“把中国纳入令日本满意的国际体系”（积极性关联）战略。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对日本有利，但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威胁”被认为源自中国的弱，起因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封闭性等。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寄予厚望，目的是使中国作

为“普通国家”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取得了成功。

不过，中国自身也进行了旨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变革，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目标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外交政策。而且，中国在时代认识问题上暂时搁置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放弃了融入国际体系是对发达国家“附属”的想法，认为融入国际体系会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等。

但是，1989年6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日本因是“西方的一员”要与美国合作，冻结了给中国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同时，日本还是第一个为日元贷款解冻而行动的国家，从1989年7月的巴黎七国首脑峰会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不孤立中国”的主张取得成功。当然，在搭建亚洲与西方桥梁的背后，还有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为了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要求重新考虑对华 ODA 战略的主张，但未被采纳。日本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濒临破产。

(7) 第6章

第6章有别于第5章所考察的积极性关联，论述了通过 ODA 所起动的消极性关联与局限性。日本对中国起动了3次冻结日元贷款等的消极性关联。第1次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后，第2次是抗议中国1995年所进行的核试验，第3次是2005年日中关系恶化。

关于中国核试验起动消极性关联的问题，日本认为“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 ODA 原则相抵触。这源于日本曾经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可以说，其根本在于表达日本无核与反战的意志。但是，中国表示反对，认为日本把经济合作与政治问题挂钩并对别国施压是干涉内政，于是，把它与过去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对日本展开批判。中国提出历史问题，把战争被害与放弃赔偿捆绑在一起，进而抨击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日本安保政策，加深了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招致中国强烈反对的背后有日中关系固有的问题，援助国日本在道义上开始处于弱势地位，所发动的消极性关联最终山穷水尽。

(8) 第7章

第7章探讨了两个问题：(i) 提供 ODA 援助是否会给受援国传递友好感情，让受援国心存“感激”；(ii) 能否通过 ODA 走向“历史的和解”，泯灭因曾经给他人带去痛苦而产生的仇恨。这是“价值”要素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日方有过对放弃战争赔偿的中国予以特别照顾的感情，中方的邓小平也有过“日本给我们的贷款最多”等的发言，因此，中日之间有感情的纠葛，中国政府高官表示感谢的言论接二连三。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因中国进行核试验，停止向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但中方予以反制，把日本对 ODA 的制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并引发围绕“反核”与“历史问题”的民族主义冲突。自此之后，日方期待中国在感谢日本的 ODA 援助时不提历史问题，并开始出现如果中国提历史问题就欠缺感谢的想法。如果中国不感谢，日方就改变做法，直至考虑中止 ODA。就这样，“双重致谢说”尘埃落定。

(9) 终章

以上各章论述了日本对华 ODA 的政策效果，终章对其中的利益、权力和价值三要素进行了总结。著者认为，“利益”要素发挥了很大的功效。首先，作为对日本 ODA 的评价之一是，它因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二，ODA 对搞活日中贸易、促进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发挥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对构建日中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因为这样的贡献，中国经济成功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在“权力”要素方面，防止“中国孤立”等的积极性关联发挥了功效，但把提供 ODA 作为制裁手段的消极性关联却没有发挥功效。在“价值”要素方面，著者指出，虽然日本因提供 ODA 援助收获了“感激”之情，但过于期待实现“历史认识”的和解则有其局限性。

关于三要素的关系，著者指出，“当援助国与受援国在三要素上达成平衡时，ODA 会成为援助国非常有效的对外政策手段”，而且，当 ODA 与受援国自身努力的方向一致时，也能发挥作用。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

3. 对该书的点评

(1) 章节构成的问题

该书剖析了日本 ODA 的决策过程，并将其过程所带来的成效置于利益、权力和价值三要素的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在阐明决策过程时所运用的广博知识与学术著作对提高该书的价值发挥了十二分的作用。

但是，该书论述不免有累赘之感。具体而言，第 1 章到第 7 章会就序章中概述过的内容进行详尽论述，因此，序章应仅限于说明该书的写作目的和各章节构成。但是，著者在“为何日本的对华 ODA”和“该书的章节构成与概要”的部分却详细地阐述了后面各章出现的要点，在往后阅读时会让人觉得啰嗦重复。另外，各章末尾的“小结”是否有必要值得商榷。

其次，第 1 章到第 3 章是描述日本 ODA 的决策过程，论述的内容应控制在日本对华 ODA 的进展情况以及与整个日本 ODA 政策进行比较的范围。第 1 章到第 3 章详尽论述了应在“利益”“权力”章节还要详尽剖析的内容，读到后面相关章节时会有啰嗦重复的感觉。

第三，有必要超越分析框架和三要素进行更详细的理论解说，这对该书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提升十分重要。终章的内容应限于归纳和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

总之，该书的章节构成，我以为这样处理会比较妥当。前言（简写该书的序章），第 1 章：日本对华 ODA 的来龙去脉（该书第 1、2、3 章改写成 1 章），第 2 章：对 ODA 分析的理论框架，第 3 章：“利益”（相当于该书的第 4 章），第 4 章：“积极性关联”（相当于该书的第 5 章），第 5 章：“消极性关联”（相当于该书的第 6 章），第 6 章：“价值”（相当于该书的第 7 章），终章（简单归纳并提出今后的课题）。

(2) 实地访谈

该书研究了日本提供 ODA 援助的现实动态。因此，对实际从事 ODA 工作的相关人士进行

访谈想必会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成果的分量。毫无疑问，采访日本相关省厅的负责人、原海外协力基金和国际协力银行的业务主管以及中国政府的负责人（主要是从一线上退下来的官员）必定会丰富该书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从进行日元贷款业务谈判亲历者的口中听说的，他们告诉我，有好几位中方负责人当着日本负责课长们的面明言，“日本 ODA 是抵偿战争赔偿的”。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是中方的谈判策略吗？是给日本年轻负责人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吗？对具体项目的执行和金额有怎样的影响？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素材。

（3）中方项目的遴选方式

如该书所分析，日本因获得中方“感激”不多，对提供对华 ODA 援助有怨言。尤其是在项目援助的当地，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来自日本的援助。这是为什么呢？与巨大的援助金额相比，为何日本对华 ODA 在中国的存在感如此之小？只要提到“相互依存”的问题，在该书的终章，我们就有必要对中方确定最佳方案的决策过程一并进行考察。特别是与 ODA 相关项目在中国各地的落实程序及遴选方式，我们就更应了解清楚。如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的关系，特别是对承担具体项目的地方与相关企业的关系等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感激”不是向日本政府而是向中国政府表达的。就是在中国，“价值”因“上（中央）”“下（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就负责当地项目的部门而言，比起单纯的“历史问题”，他们更关心中中央政府会拨来多少钱。这样的组织运作程序不会让中国的老百姓产生资金是日本提供的意识，更何况，中国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4）理论框架的问题

我想，该书是第一本提出“利益”、“权力”和“价值”理论框架并对对华 ODA 决策过程和政策效果进行缜密分析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相当新颖的。但是，对三要素的概念关联及理论框架的论述尚不够明确，需把对 ODA 的分析置于其中进行某种定位，并往理论一般化的高度予以提升。首先，“利益”和“权力”是构成现实主义研究法的核心概念，“价值”（感情）是重视主观侧面的建构主义研究法。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两种研究法的整合问题？如果进行分别解说，其整合性也会随之缺失，进而无法对之进行理论的一般化处理。其次，该书对“利益”有特殊处理的意味，其概念仅限于经济领域。然而，这样的处理是否合适？因为这个“利益”是“狭义概念”。然而，在国际政治学中，“利益”可是“国家利益”，这一“广义概念”是会被问到的。“国家利益”可以与“影响力”相互置换，追求利益的手段是“权力”。如此看来，在分析对华 ODA 的效果时，我们可以将“利益”（影响力）和“权力”作为一个整体去解析。第三，现如今是一个国内问题很容易变成外交问题的时代，当我们考察国内与国际的相互依存关系时，把国内国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关联”概念对分析 ODA 也是有效的。我想，如果该书也沿用这一方法，就有必要对双方的主要内因做更深入的挖掘。最后是“价值”。因为包含的不仅有感情因素，还有国际上共有的规范和观念等因素，因此就涉及如何在此层面上重新定义日中关系的问题。

附记：

本来该书的书评计划在 2013 年春完成，但因书评人的亲属重病卧床，写作两度中断，故耽误了原定的完稿时间，在此表示歉意。